



坦荡与戚戚

□ 王蒙

传统文化中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辨析，表现了中华文化对于修身，对于人的自我修养，人的精神境界、精神素质、精神能力、精神内涵、性格完善直至心理结构的重视。也可以说那是古人注重各人的“内功”的表现。

如何区分君子与小人呢？如何看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品质与结构呢？最简明、最形象、最通俗易懂的话，莫如孔子说的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。就是说，君子充满阳光、表里如一、心怀宽广、实

实在在、乐观开放、舒展自如；而小人呢，格局窄小、鼠目寸光、蝇头小利、阴暗狭隘、嘀嘀咕咕、心口不一、患得患失、期期艾艾——这四个字本来是形容结巴，这里是说小人没有礼义大道，话也说不出个名堂，只能结结巴巴、吞吞吐吐、磨磨唧唧，永远的苦恼，永远的冤枉怨毒，乃至永远的危殆恐怖与心慌意乱。

这是两种霍然对立的精神趋向、精神面貌，两种心态与表情。君子与小人，分别如白天与黑夜，他们应该是视而能见、闻而能觉、极易分辨的两类人。后者是一种怀疑性、敌视性、恐惧性、迫害性的准精神病态。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，影响一个人与社会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处理，造成与他人关系的恶化、虚伪化，影响一个人三观的健康与积极，会使这样的人成为家族群乡里的消极元素。

为什么君子坦荡荡呢？关键是君子的文化自信。自己想得正，反应得正，判断得正，包容、承受、回应、反制得都有理有利有节，合道合理、合乎文明规范，大大方方。这样，他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挑战，他都处于主动地位，处于不败情势，处于堂堂正正、风正帆高悬的状态。

而小人的戚戚忧伤呢，孔子、荀子都说了，病（患）根子在于患得患失、疑神疑鬼，自己欲求的私利没有得到，小人为贪欲不得而憋屈，煎熬受罪。得到了私利，如官职名利，又怕保不住失掉奔走，更是捉襟见肘、动辄告急，比没有得到私利时更不放心，更加煎熬难受。

这要认真选择了。君子一身正气，光明正大，坦白公正；小人洋相出足，漏洞百出，苦不堪言，自寻烦恼。何去何从，还需要多说吗？

（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原文化部部长）

求是书院：务求实学 存是去非

□ 全定旺

求是书院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，为浙江大学前身，位于杭州市大学路（原蒲场巷）。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杭州知府林启以普慈寺为院址，筹建新式学堂，定名为求是书院。书院成立后，由于清末新政的推进，数年内三易其名，1903年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。1927年，第三中山大学在求是书院旧址蒲场巷成立，并于次年，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浙江大学迁至老和山下玉泉新校址。求是书院旧址现存原普慈寺大殿，为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。

（一）

求是书院创办者林启（1839—1900年），字迪臣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后为编修，放陕西学政，1889年任浙江道监察御史。他为官刚正不阿，因上疏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营造颐和园，被外放衢州知府。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，守杭近5年，勤于治理，政平人和，时人评价他“治杭得其政，养士得其教，为匹夫匹妇得其利”。于杭州任上，林启兴办了三所学校，即求是书院、蚕学馆、养正书塾，以求是书院最为著名。

书院成立时，正值内忧外患之际，面对列强侵略，有识之士发愤自厉，以求自强之道。而教育者，图强之嚆矢也。甲午战后一二年中，汪康年曾回杭各方奔走，拟创办新式学堂，“因官绅梗阻，久久未遂”。林启来守杭后，认为原有书院“只空谈义理，溺志词章”，不能适应革新需要，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，就寺兴学，然顾虑杭绅或又中阻，遂以书院名之。林启任总办，负责制定章程、延聘师资等事宜。

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可借鉴的新式学堂。林启曾与梁启超商讨，梁氏认为，培养人才，“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，知其所以然之故，而参合之于西政，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”。故他主张：一、聘一通古今达中西之大儒为总教习。二、日课以中西政学之书为定课，“以今日新法证群书古义，而详论其变通之由与推行之道”。三、每月设月课，其题多用策问体，举政学之理法以叩之。求是书院师资、课程、考试与梁氏所言若合符节，以培养有政治头脑、关心国事之人作为首要任务。

求是书院成立后第二年，戊戌变法



失败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，书院亦面临困境，求是学生钱均夫回忆：“政变后，退学者甚众，留者不过十之一二”。面对守旧派攻击书院“伏有新党，应予查封”，林启临危不惧，以身家性命担保求是并无新党，使书院得以延续发展下来。

（二）

求是书院秉持“居今日而图治，以培养人材为第一义；居今日而育才，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”的宗旨，杂糅中西，倡导变革，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。

第一，采用了与传统迥异的课程设置模式。教学中增加了西学内容，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读两类，必修课有国文、英文、算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化学等课，选读课有日文、音乐等课。鲁迅曾回忆青年求学的情形，他对绍兴的中西学堂“却也不满足，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、算学、英文和法文。功课较为别致的，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”。可见，开办仅一年的求是书院课程已非常丰富。

第二，重视国文教育和民族意识的培养。林启在为廖寿丰所写的奏章中指出，当时中国积重难返，时变日亟，国人不满传统的“词章帖括”，而追求西学。现实中不少人则借西文谋财图利，不但西学无成，而亦忘古代圣贤之教。故书院以国文为必修，积极礼聘宋恕、袁毓麟、马叙伦等博学名士。然而，书院对国文的重视又突破了传统的“词章帖括”，在招考通告中，明确规定报名者“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”，并规定在

校学生课余时间应对“时务尤当留心”。

第三，重视启发式教育。宋恕自从被聘为求是书院国文总教习后，便在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启发学生，“到校未一年而校风顿变”。钱均夫回忆道，国文不是由教师直讲，而是由学生自行研阅，有疑则发问。然学生须每日作札记，由教师批阅。许寿裳在《〈宋平子先生评传〉序》中赞誉宋恕：“掌教杭州求是书院，余幸得亲炙，虽为时仅四月，而获益之大，受知之深，毕生不能忘也。”

第四，鼓励学生关心国事。书院学生在宿舍开辟“书报阅览室”，组织“励志社”，定期举办读书会、讲演会，“砥励品学，促进维新”。在校外则积极响应《杭州白话报》运动，由同学们集资定购，分送到书院附近的茶馆，并进行讲解，教习孙翼中曾担任《杭州白话报》主笔。该报有论说、中外见闻、杂文、译文，从多方面批评陋俗、提倡妇女教育等，“其立论浅近，唤醒民众，打破旧习”。

（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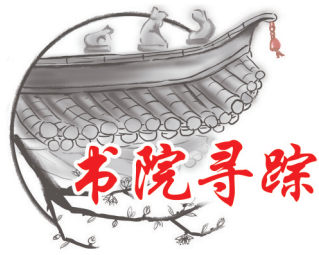
由求是书院而出者，类多成材。如求是学生，后任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所言，书院成立时，科举未废，若有学子“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”，“此显然为一种学术救国之自觉及牺牲利禄之精神”。正因为有此精神，故成就者众。如蒋百里等学成后，参加了辛亥革命，在军界任职。许寿裳、钱均夫、厉绥之等在教育事业上颇有建树。学术上，理科方面有夏元瑛，工科方面有陈槐、何燏时等。此外，中共创始人之一

的陈独秀亦是书院的早期学生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浙江响应武昌起义，不久全省实现光复。据马叙伦的观点，求是书院对于浙江光复具有“直接的历史影响”。邵裴子谈书院办学历史时也曾说道，求是书院“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”，“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”。书院中人物与革命相关者颇多，这既与时事有关，亦与书院师生积极参与革命密切相关。如许寿裳回忆宋恕时说：“余窺先师实乃一伟大革命之学者”，“虽不倡言革命，而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缓一日也”。教习孙翼中曾以《罪辨文》命题，高年级学生在辅导评阅时将“本朝”改为“贼清”，险酿成“罪辨文案”。后来，求是书院蒋百里等浙籍留日学生创办《浙江潮》宣传新思想，编辑发行者还有求是书院的许寿裳、孙翼中、王嘉榘等人。

求是书院的师生还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。求是学生、光复会会员沈晓民认为光复会的成立与东京“浙学会”有一定关系。而东京“浙学会”则是求是书院“励志社”活动的延续，1901年夏，由于“罪辨文案”，“励志社”骨干纷纷离校，部分社员到了日本。据沈晓民回忆，在东京的“浙学会”会员，曾两次聚集在王嘉榘的寓所密商，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。1904年，光复会于上海成立，蔡元培任会长，孙翼中、蒋百里、许寿裳、王嘉榘等求是师生均是光复会成立时的会员。

求是书院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其所形成的风气至关重要。钱均夫指出，书院自创建以来逐渐形成“正其道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”的求是学风。郑晓沧认为求是有双关的意义，一为“务求实学”，二为“存是去非”。抗战时期，竺可桢任浙大校长，继承求是书院的传统，确立了“求是”校训，并多次谈到“只问是非、不计利害”。从求是书院到浙大，学风一脉相承，其根本目的亦在于培养能“担当大任、主持风气、转移国运”的人才。



朱自清的扬州情结

□ 张永祚

有史以来玲珑剔透的非凡魅力。朱自清在《扬州的夏日》中说，“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，在我看，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”。有时候也会大雨滂沱，“永定河、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，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”，因为它们与江南常年的丰沛茂盛难以媲美，即便是“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”，但也“太平衍了，一览而尽”，没有江南之水那样的曲径通幽和柳暗花明。

朱自清在这里从少年走到青年，对瘦西湖的景致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：“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，法海寺，五亭桥；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。”小金山是瘦西湖中的小岛，有湖心佛寺、玉版桥、湖上草堂、观音殿、六方亭、酌诸渚胜，“在那里望水最好，看月自然也不错”。法海寺的白塔，说是盐商们为了讨好乾隆皇帝，按照北海塔的模样，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。五亭桥是瘦西湖的标志，“桥是拱形，中一亭最高，两边四亭，参差相称”。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：“每当清风月满之时，每阔各衙一月。金色荡漾，众月争辉，莫可名状。”所谓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，正是这种灿烂莹烁的点睛之笔。登上平

山堂，凭栏远眺，驰目骋怀，“江南诸山，拱揖槛前，若可攀跻”，飞扑于眉睫似与堂平，直接把王维的诗句变成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，用朱自清的话来说，“‘山色有无中’一句话，我看是恰到好处，并不算错”。

“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。东海就是海州，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。我就生在海州。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，将我们接到那里”。扬州的邵伯镇原名步邱，因东晋太元十年（公元385年）谢安于此筑埭造福于民，百姓把他比作西周的召公，因为古代“邵”和“召”同音，就把步邱改为邵伯。朱自清说他们全家当年“住在万寿宫里”，在这里待了两年时间，“万寿宫的院子很大，很静；门口就是运河。河坎很高，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。邵伯有个铁牛湾，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”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除了那条铁牛还在守望看滔滔运河，万寿宫早已不复存在，甚至遗址在哪里也无人知晓。但朱自清清楚地记得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，他们一起上私塾，爬运河堤，游铁牛湾……这些孩提时代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场景，给他留下了非常

深刻的印象。“青灯有味是儿时，其实不止青灯，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”。童年的记忆是最单纯最真切，影响最久，哪怕是在走南闯北经历了大半生之后，仍然无法忘怀，无限眷恋，历历在目，回想起来最有意思，在他的笔下也会因此常常浮现出淡淡的乡愁和浓浓的深情。

1903年，“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，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”。朱自清一家来到扬州城后，第一个落脚点，就是在城北的天宁门街。到了1909年，由于房主变卖房产，朱自清一家搬到了弥陀巷中段西侧的一条小巷中。1913年，朱家从弥陀巷搬到了皮市街，在这里又住了两年左右。1915年，朱家搬到琼花观街。1917年冬天，父亲朱鸿钧丢了差事，祖母又因病去世。朱自清奔丧回家，后又回北京上学，朱鸿钧同行去南京谋事，但未能谋到事。1923年，朱家又搬到东关街路北的仁丰里；1930年春，又搬迁至安乐巷27号。这是朱家的最后一站，他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平安快乐。

这是一座典型的扬州传统民居，门旁有“朱自清故居”的标牌。进入

大门有过道，内有一个小院子，布局优雅，细致精致，薄砖铺地，条石镶边，青苔接缝，砖墙细瓦，雕花屏门，古朴大方。正屋厢房，井然有序，红木清漆打造的窗栏、案几、条桌、橱柜、大床和房间里的陈设，都保留着原有的风貌，可以想象出当年朱家人的寻常日子。

因为家庭生活拮据，朱自清的预科和本科都是提前读完的。大学毕业，他回到自己曾经就读的江苏省立八中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。“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，没毕业；读高等小学，毕了业；读中学，也毕了业”，1916年他是在八中毕业后，考入北京大学的。此次重回母校，怀着报恩的心情，他决心好好地干一番事业，校歌一挥而就，勃勃雄心清晰可见：“浩浩乎，长江之涛，蜀冈之云，佳气蔚八中。人格健全，学术健全，相期自治与自动。欲求身手试豪雄，体育须兼重。人才教育今发煌，努力我八中。”短短几行，句句经典，凸显人文的教育理想和现代的教育理念，深情劝喻学生们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。

我们曾经读过许多关于扬州的诗句，这里有李白的“故人西辞黄鹤

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姚合的“春风落帆日，满耳是笙歌”，杜牧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等，对于满贮这些诗句的人来说，扬州确实如火般的热烈，像水似的温柔，有着海市蜃楼一样的辽阔美丽，但在朱自清的笔下，扬州不只是这些诗和远方，还有着引人入胜的市井味道。他在《说扬州》中写道，“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。这个保你没错儿。北平寻常提到江苏菜，总想着是甜甜蜜蜜的”“倘若有着相当的假期，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；自然，得带点花生米，五午牛肉、白酒”。

此时的扬州，春柳袅姿，婀娜娉婷，月下轻音，如歌似箫，修竹千竿，绿荫冉冉，读着朱自清《我是扬州人》《扬州的夏日》《说扬州》等作品，每每就好像坐上时光机，一键就可以秒回过去，实现与作者遥遥多年的深情相望。无论朱自清无法忘却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还是至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铁骨铮铮，都充满着赤子之心的家国情怀，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它们的历史土壤。



春到扬州草木知，“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。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。扬州是个好地方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璀璨，朱自清说，“我是扬州人”。与生俱来的诗情画意，耳濡目染的岁月沧桑，使得扬州这个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”，对于朱自清的理想建构和人格形成以及文学抱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扬州其实是在江北，却当之无愧地翘楚于江南板块。这里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处，南来北往，东进西出，风帆点点，船只匆匆。千年款款之水，菁菁流淌之魂，造就了